



这个夏天，一个接一个的艺术大展，一个接一个的世界级美术馆的到来，如同直射的阳光带来的能量，一起点燃了这座城市里人们对于文化精神生活的向往。

据悉，继2019年开馆展“时间的形态”后，西岸美术馆与法国蓬皮杜艺术中心五年展陈合作计划，将从7月28日起至2023年2月5日进入第二个常设大展“万物的声音”的合作，这一次的展览，将“一网打尽”立体主义先驱、达达主义与超现实主义先锋人物，以及当代观念艺术前卫代表。乔治·布拉克、巴勃罗·毕加索、费尔南德·莱热、马塞尔·杜尚、曼·雷、让·廷格利、塔蒂亚娜·特鲁维、梁慧圭等艺术史上耳熟能详的艺术家的重要作品，并按时顺序铺陈于西岸美术馆一号和二号展厅。可以说，展览的前半部呈现的是一个属于先锋艺术家的世界，以杜尚创造的“现成品”艺术为代表，看到的是艺术家如何用创意推翻旧程式；展览的后半部就是透过波普艺术家、新现实主义和激进派运动的成员的视野，再现在消费主义盛行下，“物”在艺术中的角色。

如果说西岸美术馆与全球最重要的当代艺术中心蓬皮杜的合作是一次现当代艺术万花筒式的巡礼，那么与其一江相隔的浦东美术馆与英国泰特美术馆的合作，可以说是一道从19世纪西方古典艺术贯穿至今的强光。浦东美术馆刚刚启幕，就已经成为上海热力四射的崭新文化地标，闪耀的光芒不仅仅在于普利茨克建筑奖获得者让·努维尔设计的白色建筑体本身，也在于为建筑注入的灵魂——艺术作品。为了此次浦东美术馆的开馆大展，泰晤士河畔的英国泰特美术馆拿出了100多件珍贵藏品，包括《奥菲莉娅》、英国风景画先驱透纳、康斯太勃尔在内的诸多堪称镇馆之宝的作品；西班牙米罗美术馆也带来了迄今为止在中国最大的胡安·米罗展。浦东美术馆与泰特合作的不仅是展览，更有运营模式的深度合作——泰特将为浦东美术馆提供为期三年的咨询服务。

无论对于2019年启幕的西岸美术馆，还是开幕不久的浦东美术馆，与世界顶级美术馆的合作都是难能可贵的。因为艺术品的特殊性，对于合作场馆在运输、展陈、保存方面的条件极为严苛，对于运营人员的要求亦如是，所以，但凡拥有一件件珍贵的藏品的博物馆美术馆都不大愿意把藏品出借给新建之馆。大英博物



# 世界顶级美术馆为何青睐上海？

◆ 徐佳和

馆、蓬皮杜艺术中心、伦敦泰特美术馆、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这些世界顶级博物馆都是所在城市最经久不衰的名片，还有什么比它们更能代表所在城市的底蕴、高度和实力呢？而汇聚了各自文化菁华的他们，为什么如此青睐上海？

近些年，上海双年展、民营美术馆群落、大型艺博会与国际画廊拍卖行等艺术机构的建立，逐渐完善塑造了一座城市动态发展的艺术生态。以丰富多样的艺术场馆为代表的软实力是一块特别的城市发展“拼图”，对上海而言，价值观、文化、制度等要素构成的无形力量，更直接地决定城市吸引力和竞争力的强度和速度。各个类型大型艺术场馆的建设和公共文化空间，已经是上海与世界交流的重要窗口，不用远赴伦敦、巴黎、纽约就能看到这些珍贵原作，不论对城市里的普通观众还是本土创作者而言，都是一份文化厚礼。

更重要的是，这座城市土地与文化孕育了一个相比别的城市更庞大的热爱艺术的人群，日积月累的眼光培养了一群世界级的观众，这正是社会与人心的现代化发展带来的必然结果。当下的世界正变得日益动荡和不安定，很多的隔阂都因为人们对其他文化的偏见和无知而产生。而博物馆美术馆可以通过历史的呈现、文化的解释，对世界产生积极影响。

谁都不会忘记，曾经于2017年夏天火爆的《大英博物馆百物展：浓缩的世界史》，在上海博物馆门口引发了长长的排队风景，首日排队最长的时间竟然达到5小时。艺术的热量还辐射到了上海的周边城市，队伍里常常看见有拖着行李箱赶来观展的观众。

蓬皮杜中心馆长伯纳德·布莱斯涅在与西岸美术馆的合作之初曾经说过：“蓬皮杜非常注重上海的艺术生态，注重在此土壤上发生的所有事情，我们希望能够融入上海当地的艺术生态。我们不是法国风格艺术的代言人，我们想成为新一代上海人。”

当世界顶级博物馆美术馆纷纷选择与上海合作，把展览输出到上海，意味着上海正在向世界级艺术中心迈进，在上海，看到世界；在上海，让世界看到我们，这个国际文化大都市实至名归。



扫一扫请关注“新民艺评”

# 找到建筑的多样化美学标准

◆ 范文兵

大众最常问建筑人士的问题就是：你的设计风格是什么？“设计风格”似乎就对应着约定俗成的“标准答案”——例如，西方古典象征高贵；中国古典象征振兴；国际极简象征现代；小清新象征年轻；赛博朋克象征未来；多元拼贴象征东西融合……围绕这一建筑形象定义问题，业内经常陷入各执一词的缠斗。当然，最后获胜的往往都是出资方，失败的往往是专业人士。

建筑，是一个与所有人日常生活都息息相关的实践型专业，专业与大众都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都应得到重视。大致有六个因素，会影响建筑形象的建立，不同情况下，各个因素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力不尽相同，从而造就了建筑千变万化的形象。

首先，就是建筑的使用功能。亦即，建筑是做什么用的？它是住宅、办公楼，还是学校、美术馆，抑或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不同的使用功能，会让建筑的大小、高度、规模、组合方式等产生很大的不同，形象自然就会不一样。

其次，建筑的投资价值几何。很多建筑，包括城市，其投入资金不同、投资主体的差异，都会导致建造功能与规模、内部结构选型和选材差异。自然而然，建筑的样貌也就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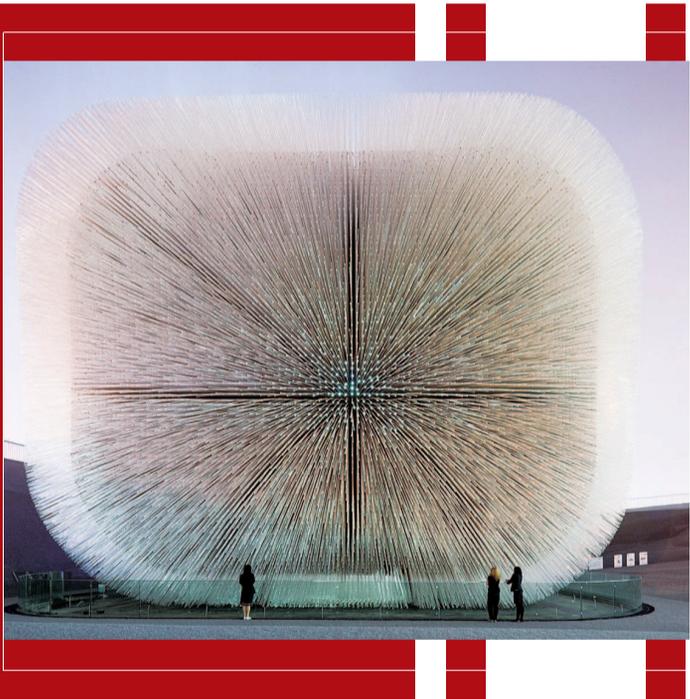
再者，建筑所处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也是要素。世界各地的气候、地形各异，即便同一

曼哈顿看到的摩天大楼，顶部几乎都是随高度普遍缩小的特征——这其实是符合城区规划法规要求的结果，目的是不遮挡阳光以及视线。荷兰阿姆斯特丹运河沿岸，有很多密密麻麻挨在一起的传统住宅——那是因为以往，荷兰是按照建筑面宽来收税的，所以房屋的面宽要尽量做窄……

第六，就是我们如今引业内外高度关注的使用者、设计者的审美与习俗等。建筑使用者、设计者的生活方式、社会文化习俗、审美倾向、哲学观念等也对建筑形象产生影响。如北京天坛，作为古代皇帝祭天之作，就包含了很多中国传统习俗的象征意义。祈年殿，是祈求丰收的祭所，殿内立柱内圈为四根，中圈及外圈均为十二根，象征四季、十二月、十二时辰和二十四节气。天坛整体体现出“天圆地方”的哲学观，其屋顶颜色基本采用了蓝色琉璃瓦，是受到“天蓝地黄”传统观念的影响。古希腊的柱式也有其文化内涵。陶立克柱最简单，看上去很有力量，象征着男性的刚健；爱奥尼柱一般比陶立克柱高，看上去苗条一些，象征着女性的柔美。

以当今中国建筑学业内外的交流情况来看，前五个因素影响相对客观、明确，比较容易理性推导出双方都能接受的建筑形象。而第六个因素，在文化环境相对独立，设计、建造与使用者密切相关的乡土社会里，也容易明确交流。但是，在今天高速发展的中国，多元文化未必能够达成共识的环境下，双方想要达成有效交流，都应拓展思路、换位思考。

对于公众领域的建筑设计，就要考虑得更全面、深入。第一，要认识到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不同。绝大多数建筑都具备不同程度的公众性，这决定了过于个人的趣味，不适于“公之于众”。曾有一度，广州恒大新足球场设计方案看起来比较像是莲花，就引发了具象还是抽象、高雅还是低俗审美的热议。最终，方案回归为“抽象美”。第二，要认识到现代化观念，是整个大趋势。机械美、抽象



城市或同一乡村，建筑是靠近马路还是靠近公园，是靠近河边还是沿着山坡，所处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也是不同的。对于房子的开窗采光，还会受到地理因素影响，例如北半球的房屋，应该在南面多开窗；南半球的房屋，应该在北面多开窗；如果房子建在热带海边，就会开大窗户，还会有门廊、大阳台等设施，利于遮阳、通风；如果房子建在寒带，开窗就会小很多，墙体也会做得比较厚，以保暖节能……

还有，就是建造技术与建造材料的影响。建造技术与建造材料，是构成一座建筑骨架的本质因素。例如欧洲教堂都造得越高越好，以象征宗教意义，但由于技术所限一直未能如愿。直到14世纪哥特式建筑时期，出现了尖肋拱顶、飞扶壁等技术，教堂才真正做到了高耸向上的空间形态。近来，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高新技术的出现，也给建筑带来了新的技术突破。此外，还出现了新的材料，如可印刷的水泥、透明的石头、可自主呼吸的生态材料等。因而，如今的建筑已经摆脱了原先局限于笛卡尔坐标系里的形态，可以做到前所未有的动态感、连续曲面、光滑质感。

第五，就是建筑相关法规的规范。各种法规，包括城市规划、城市交通、防火和消防规范、经济法规等都会影响建筑形象。例如，在纽约

美与象征意义的表达并不矛盾，还可避免过分追求具象化过程中，使用功能和细节上的浪费。例如上海世博会英国馆，设计师用了6万根蕴含植物种子的透明亚克力杆，组成巨型“种子殿堂”，也成为送给中国的礼物，堪称当今世界最佳建筑设计之一。

对于建筑专业人士而言，一方面，不要用形式主义肤浅解读大众美学诉求。建筑师要关注生活、文化、人性，探究形式背后的真正诉求。曾有一位业主想复制美国白宫做自己的办公楼。建筑师问他，是想复制白宫还是想要它代表的气派？业主表示，想要气派。于是，建筑师建议，表达气派的方式有很多种，解读了如何通过比例、尺度、材料、细部共同铸就真正的气派。最终，在避免山寨建筑的同时，也帮助业主看到了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另一方面，要尊重大众对“具象、象征”的文化以及美学诉求。某建筑设计师设计的幼儿园，以“活力岛屿”“童话森林”为概念，采用专业认同的“本体”手段——建造的、材料的、空间的、基地的，进行发展，在抽象与具象之间找到了平衡。

与其双方陷入感性的“美学之争”，不如逐渐找到双方共同认可的理性的“多样化美建筑标准”，避免建造出具象如福祿寿天子大酒店、各种山寨欧洲小镇这些令人忍俊不禁的建筑或城区。